本版编辑：兰文飞
E-mail：t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7

党风党纪

从党章发展历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重温、回味党章的历史，可以从中汲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 蔡钊利

党章的历史进程印证着政党成长发展的足迹。重温、回味党章的历史，可以从中汲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追溯共产主义运动的本源，牢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真谛。1847年，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章程，提出了革命的目标，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规定了同盟及其成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向全世界宣告了共产党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这个章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同盟的无产阶级性质。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帮助法国和美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有关党章的思想，认为党的纲领是党诞生的标志。俄共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在列宁领导下制定了俄共党章。俄共党章是第一部正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章程，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正式形成，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各自章程提供了范式和蓝本。无产阶级政党早期的党章鲜明地揭示了其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后的党章都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回顾建党之初的开天辟地，坚信“其端甚微，其势必盛”的信念。1921年7月，由于党尚处于探索阶段，形势所迫、时间所限，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共15条（现存文献缺第11条），700余字，前3条带总纲性质，后12条是组织章程。《纲领》对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制度和结构作了规定，就其性质而言是党纲，实际上发挥了党章的作用，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时，一大决定由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局起草党章，提交二大讨论通过。二大党章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部正式章程。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和附则等6章内容，共29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作了具体规定。与一大党纲相比，二大党章从根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上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二大党章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最后完成。

追忆革命时期的苦难辉煌，坚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信心。从三大到五大，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和自身壮大的需要，党在这段时期对党章进行了三次修改。三大通过的第一次修正章程，严格了入党手续，分别规定了候补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四大通过的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规定了党的基层单位为支部，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在大革命危急时刻召开的五大没有通过新党章。会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修正章程决议案，把“党的建设”单列一章、第一次明确了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六大到七大之间的17年，是我们党经受苦难走向成熟的关键期。七大通过了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最成熟的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一次增写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总纲，明确阐述了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特点、方针；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第一次对民主集中制作了科学表述；第一次把“四个服从”载入党章。标志着党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全面进步。

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探索，铭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箴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77年党的十一大，制定和通过了4部党章。1956年通过的八大党章是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的第一部党章，是对七大以来11年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后7年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为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但由于各种原因，八大党章制定的正确原则没有得到贯彻。“文化大革命”中通过的九大、十大党章，是在“左”的错误指导方针下制定的，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十一大党章部分恢复了七大、八大的正确表述，但沿袭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没有彻底纠正“左”的错误。

聚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定力。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首次将四项基本原则载入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增加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等5章。十二大党章比较全面正确地回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转移，具有里程碑意义，成为新时期党章修正的蓝本。十三大党章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组织制度、中央组织、基层组织、党组等方面对党章做了13处修改。十四大党章第一次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充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内容；首次提出“党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任务。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七大党章增写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新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体系”；增写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内容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章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始终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展望伟大复兴的光辉前程，挺直勇于担当的脊梁。十八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写入党章；充实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增写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内容，把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充实完善关于党的建设总体要求的内容，增写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新内容；与党章总纲部分相衔接，适当修改了关于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有关内容等。十八大党章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成果，体现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

党建智库怎么建

□ 徐月高

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23日对全国党建研究会做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全国党建研究会要“发挥党建高端智库作用”，这对于加强和深化党建研究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加强新形势下的党建智库建设，笔者有以下几点初步思考。

整合智库资源。握指成拳，才有力量。建设高端智库，必须掌握高端资源，特别是高端智力资源。只有掌握高端的机构资源、高端的人才资源，才能取得高端的研究成果。党建高端智库发挥在党建研究领域中的“领头羊”作用，在凝聚整合研究资源上具有独特优势。着眼于高端定位，打通“条条”与“块块”之间的壁垒，消除部门、区域、学科、机构相互之间的屏蔽，有效整合党政部门、党校系统、科研院所、学术团体、高等院校，以及社科研究基地等资源，推动党建智库要素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聚集，避免智库“孤岛”，促成智库“群岛”。借鉴国际成熟的经验，立足党情、国情，完善党建智库组织架构体系，创新智库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加快形成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面向全国合理布局研究基地，统筹配置研究资源，搭建高端研究平台，完善区域布局、专业布局、层级布局，避免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的现象，杜绝同质化、碎片化的问题，从而实现智库资源配置的集成创新。

注重协同研究。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随着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化拓展，党建领域的重大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其鲜明的全局性、综合性、整体性、复杂性，涉及的方面多、层次深、覆盖广。对这些问题的表现形态、原因诊断以及解决路径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学科的视角，而要依赖于尽可能多的不同学科的同时介入，相互协作，联合攻关，凝聚各方智慧。当代智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开展多学科、跨学科协同研究，国际著名智库的重大研究成果大都是通过“联合作战”取得的。因此，学科协同是智库进行决策研究时奉行的一种基本方式。一定意义讲，方法决定质量。在强调学科协同的同时，也要注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目前要强调引用定量分析、统计分析、模型分析、大数据分析，以提高咨询研究的科学性，从而推出更多的原创性成果。

突出专业特色。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进入关键时期，党的执政环境和所处的历史方位正在经历深刻变化，治国理政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如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加强党建领域的高端智库建设，着力提高专业化水平，在服务党和国家战略需求、服务中央决策上发挥引领作用。搞好党建高端智库建设，必须有担当有格局有谋略，关键是要坚持走专业化路子，在瞄准前瞻性、着眼应用性的基础上，突出专业性，彰显大智慧。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党的建设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自觉聚焦“题眼”，精准发力攻关，推进理论创新，加强对策研究，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精”的专业优势。

加强智库与媒体互动。智库与媒体相对独立，功能定位不同。但两者都是智慧高地，之间具有兼容性，完全可以融合发展。就成果的传播力而言，现代智库具有一定的媒体功能，因为智库生产的智慧产品，需要影响社会，不可能也不应该自守“斗室”。就传播的影响力而言，媒体也有一定的智库功能，特别是一些媒体的“内参”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有人这样打了一个比方：智库是不叫媒体的媒体，是“亚媒体”；媒体是不叫智库的智库，是“亚智库”。为此，党建高端智库一方面要开发自办媒体，如要报、出版物等，还要积极搭建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另一方面要注重利用好专业化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加大智库成果的推介报道力度，不断扩大和增进社会认同，为公共决策增强群众基础。

参考与建议



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 李东朗

1935年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贵州赤水河之间，巧妙地在国民党重兵中迂回穿插，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在反复调动和疲惫国民党大军的过程中，成功地摆脱了遭受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危局，乘隙实现了北上和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目标。此即长征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一渡赤水

鉴于贵州贫瘠、落后，并且多山、多河，战略周旋不便的情形，遵义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据此，中革军委制定《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计划在宜宾与泸州之间北渡长江入川。中央红军从1935年1月19日开始，3路纵队逐次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

1月27日，中央红军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并攻占土城、二元场、习水等地。但川军已先于红军占领赤水城，并置重兵在土城以东堵击红军。为打开北渡通道，中革军委以红1、红9军团阻击由赤水、习水南进的川军，以红3、5军团为主力围歼土城地区的川军。28日，红3、5军团向土城、青杠坡地区的川军发起猛攻。但由于敌情有误（不是侦察的4个团6000千人，而是9个团1万多人）、对川军战斗力了解不够，红军经过激战，虽然予敌重创，但未能取得预想战果，并遭到川军疯狂反扑。由于战斗形成对峙状态，各路国民党军奔集前来，再战将使红军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于是，毛泽东建议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中共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1月29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中央红军随即从元厚场、土城南北地区分路西渡赤水河。此为一渡赤水，摆脱了严峻的敌情。

二渡赤水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计划经古蔺南部寻机从宜宾以上的金沙江抢渡。川敌立即以8个旅分路追截，以4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黔敌和滇敌分路向川南追来。

鉴于敌人已经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进逼的情势，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渡江北上四川的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2、6军团；将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第二路军，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吴奇伟（4个师）、周浑元（4个师）、滇军孙渡（3个旅）、黔军王家烈（5个师）4个纵队，与川军潘文华（12个旅）一起，围歼中央红军于“叙、蔺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对此，他非常兴奋：“乃有堵截围歼之望”。

针对国民党军大量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的形势，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转兵东进，再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2月11日，红军分三路由扎西秘密回师东进。18日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

红军的回师东进，乘虚直入，2月底3月初，经5日激战，红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直打到乌江边，消灭吴奇伟纵队2个师、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缴枪2000多支，俘敌3000多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并且是对“追剿”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大胜仗，获得大量武器弹药等物资补充，士气受到很大鼓舞。

三渡赤水

红军东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恍惚、焦虑，在日记中写道：“匪向东窜乎”，其“向东回窜，颇可顾虑”，感到“局势严重”，但又自慰说“遵义又陷，是围剿良机”。3月2日，蒋介石飞赴重庆，部署对红军发动新的围攻。他认为中央红军“似拟经湄、凤东渡乌江，希与萧贺合股”，因此：令周浑元纵队和川军郭勋祺3个旅会攻遵义；令湘军何键部3个师 “以主力守备乌江沿岸”，又令吴奇伟一部及黔军一部 “守备乌江上游”，以 “歼灭该匪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区为目的”。把防止中央红军东进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作为主要决策点。

为了实现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中革军委决定打击一直对红军紧追不舍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为此，3月4日中革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3月5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周浑元部）肖、谢两师的部署》。但由于周浑元纵队坚守不出，红军为达到目的而被迫于3月15日发起鲁班场攻坚战，结果激战一天，未能攻克。鉴于敌人蜂拥而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 “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3月17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

四渡赤水

红军突然三渡赤水的行动，再次搞晕了蒋介石。他在3月16日日记中写道：“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17日写道：“匪果西窜古蔺乎？”18日写道：“匪向古蔺东南地区窜进，其将越赤水河南而西窜乎？”他惊恐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再向赤水河西集中，并令各地星夜赶筑碉堡，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再度围困红军在赤水河以西，迫使红军在古蔺地区决战。

红军三渡赤水的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各路军队再次调动到赤水河西岸，然后乘虚寻机东进。因此，中央红军在赤水河西只停留了5天，在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队蜂拥西来之际，3月20日下午，中革军委下达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21日夜，中央红军以突然行动闪电式四渡赤水，把正在赶筑碉堡的国民党重兵抛在赤水河西。26日，红军再次迫近遵义地区。

红军四渡赤水后，决定南渡乌江。为此，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部队，向西面打鼓新场一带急进，吸引乌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北上。在乌江沿岸设防的国民党周浑元纵队被迷惑，尾追红9军团而去。红军主力乘虚南进抢渡乌江，杨尚昆回忆说：“30日，我们到达乌江边时，南岸的守敌只有一个营，我军先头部队在风雨呼啸中乘竹筏渡乌江。第二天，大军分三处架设浮桥过乌江。”此举，把国民党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担任诱敌任务的红9军团在完成任务后，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归还建制）。

战略性的伟大胜利

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计划“调虎离山”，“把滇军调出来”，然后乘虚进军云南。即以佯攻贵阳的声势，迫使蒋介石把驻防黔西、阻挡红军进入云南的滇军孙渡部东调贵阳，以便打开红军西进云南的门户。为此，以中央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前锋逼近贵阳。

当滇军和其他各路敌军急速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急转向南，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并以一部直逼昆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在滇军东调回防不及的情况下，急调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而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乘虚迅速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前往与四方面军会师。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通过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迷惑和调动敌人，掌控战场主动权，创造战机， 既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因此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